

文化認同與文化資本：

印度尼西亞華語文問題的新發展

第五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

1997年12月30日

台北

楊 聰 榮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亞太歷史學部歷史學博士候選人

文化認同與文化資本：印度尼西亞華語文問題的新發展

楊聰榮

摘要：

華語文教學在非華語區國家大體區分有兩種不同的問題導向，一種是在歐美澳紐等國家，華語文教學並不構成當地嚴重的社會或政治問題，即使引起某種程度的議論，問題的性質也不是在於華語文教學本身，而是在華人移民適應當地的問題，然而這些國家近年來採行多元文化政策，對於各族裔本身的文化傳統的保存，甚至採取比較積極正面的態度，因此華語文教學的空間很大，主要關心的問題就在於師資、教材、教學法等等提高華語文教學品質方面。另一種主要是在華裔人口眾多的東南亞國家，問題的性質主要在於華語文教學與當地的政治社會互動關係，一般而言，從戰後到八十年代，當地國家站在國家整合的立場，對華語文教學並不歡迎，有些國家尚可容忍到一定程度，然而也有些國家採取完全禁絕的態度，這其中政策最嚴格，執行最長久而且最為著名或者說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國家，當屬印度尼西亞。

印度尼西亞曾經是華語文教育最發達的地方，康有為旅南洋提倡新式華文教育是在當時還是荷屬東印度的印度尼西亞得到支持與呼應，1900年在現今印度尼西亞首府雅加達出現的中華學校是南洋現代華文學校之濫觴。戰後印度尼西亞獨立以後，華校的數量最龐大人數最多也是在印度尼西亞，然而1958年關閉部分華校、華文報紙，1966年以後就全面禁止華語文教學，華文報紙全部取消，而僅餘一份由軍方主辦，半華文半印尼文的印度尼西亞日報，華文印刷品不得進口、販賣及流傳，到目前為止基本政策仍然維持，但是最近數年在執行上開始有相當程度的放寬。

本文首先回顧印度尼西亞華語文教育的歷史，指出華語文禁令在印度尼西亞現代史的位置，以及華語文教育和印度尼西亞國家民族主義的衝突與矛盾，然後討論九十年代印度尼西亞華語文教學的發展情況，現在印度尼西亞出現了為數眾多的華語文家教班，以及數個華語文補習班，政府甚至主導開辦華文教師研習班，學習華語文不再是禁忌。這個變化肇因於各地的華商在印度尼西亞的投資越來越大，自1990年印度尼西亞與中國恢復了外交關係，1994年又開放華語學習在旅遊業的應用，唯獨基本政策尚未改變，同一段時間印度尼西亞內部的族群關係因為時局的動盪而變得緊張，連續發生多起暴動，華人產業經常是首當其衝，不同方向的訊息，使得一部分華人感覺有一些空間，也使得一部分當年努力進入主流社會的華人感到迷惘，未來的發展如何，尚待進一步的觀察。

本文旨在將釐清印度尼西亞華語文問題的性質，補充新近發展的資訊，以及提供觀念架構做為進一步觀察的角度。從教育社會學以及東南亞歷史的角度來觀察，由於特定的歷史條件，華語文教學問題在印度尼西亞和現政權的合法性基礎以及由族群關係所引發的社會問題相聯繫，形成獨特的華語文禁令，近年來的發展是應該是個新的轉變的開始，文中參考東南亞國家華文發展的新趨勢以及印度尼西亞國家的立場，提出新的理解架構來說明最近的發展變化的意義。

文化認同與文化資本：印度尼西亞華語文問題的新發展

印度尼西亞的華語文問題是個獨特的問題，就全球的角度來說，以廣義的華語文做為第一語言的人口高居世界第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標準漢語也是聯合國指定的法定工作語言之一，世界各主要國家多視華語文為重要的外語，少有國家明文禁止華語文，印度尼西亞卻自從1966年開始華語文禁令，取消華語文教育，並禁止華文出版品在境內出版、印刷或販賣，迄今已超過三十年。就海外華人觀點而言，印度尼西亞是華裔人口最多的國家¹，也是採行同化政策最嚴格的國家，首都雅加達的班芝蘭，是號稱世界少有的全然沒有華文招牌的唐人街。就東南亞國家的歷史發展來說，雖然東南亞各國在戰後獨立，或多或少都曾有限制華語文的發展，但隨著冷戰秩序的解除都已放寬，然而印度尼西亞的華語文禁令不僅僅是涉及華裔少數民族的問題，而且連繫上整個國家政治發展的歷史，全面禁止華語文教育是1965年九三〇事件後，軍方出身的蘇哈托總統上台所建立「新秩序」政體合法性的一個環節，政策考量所牽涉層面甚廣。從這幾個層面來看，九〇年代的新發展，值得特殊地關注。

九〇年代的新發展，有兩個不同方向的趨勢，一方面華文禁令開始放寬，1994年印度尼西亞政府宣佈放寬華語文教學及使用的範圍，在和旅遊業相關的範圍內可以教授華語文，此一政策宣佈被視為政策放寬的開始，惟禁止華語文的基本政策仍維持不變，另一方面，華裔族群的整合問題變得更為引人注目，由於涉及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在印度尼西亞仍然是個敏感而顯著的問題，使得華語文問題更為複雜。本文旨在分析這個新發展的意義，包含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歷史回顧，分析印度尼西亞華語文問題以及華語文禁令的歷史形成，除了參考東南亞華人史的資料，也希望參考印度尼西亞現代國家歷史發展的視角。第二部分是九〇年代的新發展，這個部分的資料主要是根據本人在1996年10月到1997年4月之間在印度尼西亞的田野調查工作及調查後的分析。第三部分提出一個分析架構，把歷史形成與最新發展放在東南亞國家與語言教育的關係脈絡中，探詢此發展趨勢可能包含的意義。

一. 印度尼西亞華語文問題的歷史形成

¹ 這主要是參考Leo Suryadinata最近出版的對東南亞全境華人的總合性研究所提供的數據，數據都是九〇年代預估更新的資料，詳見Leo Suryadinata(1995)"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In Leo Suryadinata ed.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The Socio-Cultural Dimension.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在印度尼西亞這塊領土上，近百年來華語文的發展經過幾個戲劇性的峰迴路轉，曾經一度是東南亞華語文教育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六十年代華語文禁令，令華語文教育從炫爛歸於寂靜，其中的曲折與起伏，與印度尼西亞現代國民國家的發展息息相關，要理解其中的曲折，除了參考東南亞華人史的資料以外，也必須放在印度尼西亞近現代史的脈絡來理解。尤其是華文禁令，主要導火線雖說是印尼共產黨的流產政變，如果從更長遠的歷史眼光來看，其中有更長遠的因素，即印度尼西亞的國家民族主義。

就海外華人舊式私塾學堂的歷史而言，荷印時期的印度尼西亞就顯得十分突出，最早的記錄在1690年6月，在荷印巴達維亞已由華人甲必丹郭郡觀設立明誠書院，1729年巴達維亞華人養濟院開辦義學，1775年華人雷珍蘭高根觀設立明誠書院及南江書院1787年設明德書院，皆屬義學，早於新加坡開埠。由於巴達維亞開埠較早，華人聚集多，因此有長期的辦學傳統，直到新式教育建立以前，在1899年荷印華人學塾共有369所，其中爪哇217所，外島152所，學生總數達6622人。

1898年戊戌維新失敗後，康有為到南洋各地鼓吹設立學校，被認為是東南亞現代華語文教育的開端，他也曾到星馬訪問，然訪巴達維亞之後，巴城華人領袖響應更為熱烈，1900年3月成立巴城中華會館，積極籌設華人正規學校，於1901年3月17日正式成立中華中學，位於巴城八帝貫街，人稱「八華」，是最早的現代華語文教育²，隨後荷印華人紛紛響應，兩年內在爪哇島上的丹那望、文登、茂物、萬隆、井里汶、三寶瓏、北加浪岸、八馬瓏都設立了華校。此時印度尼西亞仍為荷蘭的殖民地，稱為「荷屬東印度」或簡稱「荷屬」，荷蘭殖民當局對教育似乎不算重視，中小學的數量遠低於東南亞相鄰地區，華人除了進荷蘭文學校就讀以外，華人必須自己組織教育。巴達維亞的華文教育有其特性，華文學校採用多語教育，除了華文之外，荷蘭文、英文和馬來文都是主要的語言，這是因應環境需要而產生，直到現在，即使華語文不允許被教授，但重視英語教學的傳統卻在華裔社群以及華人主持的學校維持下來，華人族群仍是產生多語人才的族群。從東南亞華人歷史的角度來看，巴達維亞的華

² 見Nio Joe Lan, (1940) *Riwajat 40 Taon dari Tiong Hua Hwe Koan Bataria, 1900-1939*. 這是巴城中華學校四十週年紀念。

文教育不但開始最早，而且根基也好，巴城的華人經商為多，也願意為教育捐輸。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荷印的華文教育持續發展，據統計1941年荷印的華校共502所，學生約有65,000人，分布各島，爪哇島的華文學校仍是最多，有241所，然而荷印境內規模最大的華校應屬棉蘭的蘇東中學，共有八個附屬小學。日本占領印度尼西亞期間，華文教育系統大體仍舊維持，反而因為荷蘭文學校的關閉，使得部分學生轉到華文學校，戰後印度尼西亞獨立革命，荷蘭文在印度尼西亞很快式微，華語文更加抬頭。戰後十幾年的時間是印度尼西亞華語文教育的黃金時期，各地都有華文學校，即使是土生華人也熱心教育，過去土生華人父母多半將子女送到荷文學校，戰後荷文學校取消，華人子女進入華語學校的比例反而增加許多，在1948年的統計，全境共621所華校，學生141,600人。到了1957年，共計1669所華文學校，學生共約450,000人，是華文教育的鼎盛時期，這種規模可說是當時海外華人教育中最具規模的國家。

然而華文鼎盛的情況卻在幾年內灰飛煙滅，印度尼西亞全面禁止華語文教育是在發生1965年9月30日共產黨政變後制定，雅加達方面相信那次流產的政變是北京在幕後支持，但是北京方面否認。這次事件可說是印度尼西亞歷史上最重大的分水嶺，獨立以來僅有的兩任總統就是在事件後轉移權力，幾年的動盪下來，據信有幾十萬人被殺，部分華裔也牽涉其中，部分則離開印度尼西亞，新任總統蘇哈托掌握局面，開始了「新秩序」(Orde Baru)時代，華語文禁令即是在這個背景產生。政變失敗以後，共產黨被上台的軍方認為是國家最大的威脅，隨即北京和雅加達交惡，中華人民共和國被視為不友善國家，華語文禁令在1966年下達，所有華文學校關閉，校舍及設備沒收。

華語文禁令除了由於當時華語文和共產主義被聯繫在一起，也是印度尼西亞當局對於華裔採行同化政策的具體實踐，後來全面禁絕華文出版品，禁止進口、販賣和散佈華文出版品，禁令後來得到立法通過，而執行上更加嚴格，連招牌，港台電影的宣傳，流行歌曲卡帶內附的歌詞也不得出現任何方塊字。華語文禁令夾雜著對華人的憤怒情緒，有時候不免有執行過當之處，早期甚至有郵局拒絕發送有方塊字姓名地址的郵件，進口郵包經常被打開檢查，中文書刊一經發現便沒收。本人曾經聽過一名德國駐雅加達的官員私下表示，進口的德文雜誌被逐頁檢查，有照片拍到漢字或者廣告頁出現漢字便被撕去，有些漢字其

實是日文字，一律被撕去。這些情況在最近幾年已經調整，但是郵包檢查依舊，華文書刊不易寄到印度尼西亞境內。

華文禁令顯然得到民間極大的支持，九三 事件是一個歷史的大轉折，站在支持新秩序的一方，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共產革命輸出政策，使他們產生國家受欺侮的情緒反應，因而怒及當地的華籍外僑以及其所使用的語言。根據本人的訪問，在六 年代及七 年代，在爪哇許多華人都有在公共場所用華語、福建話、客家話交談，而被憤怒的民眾干預的經驗。有許多四 、五 年代才到印度尼西亞的移民，因為印度尼西亞語不夠流利，在公共場所寧可不說話。這種情緒固然可說是九三 事件直接影響所及，然而華語文禁令背後有更深遠的歷史情結，才會受到廣大的支持或接受。

如果從印度尼西亞的國家民族主義的立場來看，1928年的青年誓詞(Sumpah Pemuda)的口號即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語言」("Satu Tanah-air, Satu Bangsa dan Satu Bahasa")，可以說是其國家民族主義的精神核心，此精神核心除了解除荷蘭殖民主義的枷鎖之外，整合區域內各民族也是重要的內涵。在印度尼西亞獨立前後，印度尼西亞華裔移民的人口結構中，土生華人(peranakan)的人口所佔的比例極高，土生華人多半印度尼西亞語流利，早期有不少土生華人都是雙語或是多語人才，他們是印度尼西亞國家民族主義的亟欲整合的對象，在1945年爭取獨立之初的憲法中已經有接納其為印度尼西亞公民的條文³，印度尼西亞的建國目標一開始就希望將各族裔融合為一民族，包括這些外裔人口或其後代⁴，這個目標和戰後華人意識的發展方向不同，已經為未來的衝突留下伏筆。

從這個角度來看，自從印度尼西亞自荷蘭手中接掌政權之後，就開始對存在印度尼西亞的華文教育系統採取縮緊政策，1950年取消荷印時代對華文學校的補助，1952年頒佈外僑學校監督條例，管制外僑學校的教學內容，規定印度尼西亞語文為必修科目，1957年公佈監督外僑教育條例，不准取得印度尼西亞國籍

³ 1945年憲法第10條26款所述，外裔移民可依法成為印度尼西亞公民，見UUD 1945, Bab X pasal 26 "yang menjadi Warga Negara ialah orang-orang bangsa Indonesia asli dan orang-orang bangsa lain yang disahkan dengan Undang-Undang sebagai Warga Negara."

⁴ 在官方或半官方機構的材料中都強調這一點，詳見 Badan Koordinasi Masalah Cina-Bakin (1979) Pedoman Penyelesaian Masalah Cina di Indonesia. Jakarta: Badan Koordinasi Masalah Cina. pp: 15.

的華裔子弟進入外僑學校就讀，1958年軍方下令關閉右派華文學校，接管校產，到了1966年則是所有華文學校。這一連串的舉措都反映了印度尼西亞強烈的整合國家內部的意圖，邁向單一語言的民族政策。就以印度尼西亞語凝聚國家統一團結，並非單單針對華裔，如今印度尼西亞境內的各族裔語言，除了爪哇語以外都快速地流失，新一代都改用印度尼西亞語溝通，也是這一政策的結果，就長期來看，印度尼西亞語將成為各族裔的第一語言，殆無疑義。

就華語文的使用而言，也有例外的地方，一是在宗教方面，由於印度尼西亞強調宗教自由，少數宗教團體仍然保留一部分使用華語文的聚會，如果不散播到外界，受到的干擾並不大，但是參與人口有老化的跡象。出版品方面也有例外，唯一可以存在的是「印度尼西亞日報」(Harian Indonesia)，這是一家由軍方主控的華文印尼文雙語日報，有軍方發給的特許准字，其中的華文消息主要是從印度尼西亞國家通訊社安塔拉社的新聞稿譯出，另外有一版創作園地。小小的版面卻成了維繫華文寫作命脈的唯一管道，現在幾位還能夠以華文創作的年輕一代，都是在這片小天地成長出來。在華語教育中斷了三十年之後，新一代的華裔可以說是全部以印度尼西亞語溝通，加上印度尼西亞是推行公開的全盤同化政策，四、五十歲以下的華裔青年所受的教育和其他印度尼西亞的原住民並無二致，華語在年輕一代迅速消亡。其中也有特殊機緣者，到國外求學時進修過正規華語課程，其中有不少人是在台灣、香港、和新加坡受教育，整體來說，會華語者可說是麟毛鳳角。

二. 九 年代的新發展

九 年代開始，情況有了轉機。最明顯的政策改變是1990年印度尼西亞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正式的外交關係，以及1994年8月，印度尼西亞政治與治安事務協調部長宣佈，放寬華文的使用範圍。究竟政策的開放帶來的改變是如何，由於禁止華語文的基本政策尚未開放，許多活動介於合法及非法之間，資訊的取得難以透過正式的管道，主要還是透過訪談取得資訊，本人在印度尼西亞進行其他主題的田野工作期間，順道訪問不少家庭、私人家教、公私立機構等，雖然客觀條件上不容許作較全面性的調查訪問，但所得的材料已經足以說明最近整體性的變化。

94年局部放寬華文禁令，其主要的措施是集中在旅遊的範圍，具體的措施包括各旅館、旅行社等可以印行華文手冊，可以辦理華文補習班，培訓旅遊業華文人才等等。這些措施雖然祇是一小步，卻被認為是政策放寬的開始，就印度尼西亞的政治風格來說，是可以做這樣地理解，一般認為爪哇人的性格堅忍委婉，以爪哇人為主的印度尼西亞政治也表現出同樣的風格出來，長期的政策要調整通常要經過些委婉曲折的過程，這種小局面的放寬不致引起太大的質疑，卻傳遞出一個清晰的訊息。

官方正面鼓勵華語文的教學，在1996年6月15日「華文教師進修班」的舉辦中得到明證，這是由文化部的委託，由達爾瑪·佩薩達大學(Universitas Darma Persada)以及印度尼西亞發展旅遊教育基金會(YPPPI)共同主辦，參加首期進修班的學員共有一百一十五人，據報導報名踴躍，三天內即額滿⁵，這種活動主要的目的應該是在取得執照，學員可以得到合法的證書，以後即可擔任華文教學工作。活動所透露的訊息似乎很明白，首先，本所私立大學是由軍方人士主持，校長尤其是長期主持對華人政策的有力人士，顯示印度尼西亞當局不再把華語文當成洪水猛獸，但是活動宗旨仍是清楚定位在促進旅遊或是貿易方面，華語文仍然是受管制的對象。

民間的反應也顯得更為熱烈，首先是華文補習班開始發展，名目種類有漢語會話班、旅遊班、商貿班及翻譯班等，已經可以到公開做廣告的地步；報刊上出現代辦新加坡寄宿生的廣告，明眼人都明白這是家長考慮送子女到新加坡就讀，一方面距離很近，另一方面可以提供英語華語的雙語教語，使得送子女到新加坡大為熱門；而在雅加達的唐人街班芝蘭地區，對各地華文報章的販賣顯然是睜一眼閉一眼，而購物商場的錄音帶專賣店不難找到港台的流行歌曲，書店也出現了以印度尼西亞語學習華語文的書刊或字典，這些反應出政策鬆動的結果，一般而言，並不大張旗鼓，但是已經不再懼怕公開陳列或廣為週知。

在華語文補習班方面，根據曉彤的描述，「華文補習班如雨後春筍，到處林立，不少家長都鼓勵子女課餘補習華文。一些大企業家為提高員工的華文能

⁵ 見小沈(1996)「破天荒的第一次！首期華文教師進修班圓滿成功」第26頁，「印尼與東協」第57期(1996年7月)。

力，也請老師私下教導。」⁶然而根據筆者自己的觀察，補習華語文仍然以小班或家教班的形態為多，真正能提供正規教學的地方仍然寥寥可數。可見政策雖然開放，過去那種偷偷摸摸學華語文的心態還是清楚地存在。另外，本人曾走訪不同宗教團體，發現有些宗教團體在最近兩年開辦了華語班，都是在感到政策放鬆之後，開始考慮給下一代華語文教育的機會，但是前多半處於剛開始階段，尚在摸索嘗試。

這種形態的華語教學在效果上仍然打了很大的折扣，筆者訪問過幾位以家教華文為副業的老師，有老一輩曾經受過華文教育者，也有台商的眷屬，或是曾在海外留學者（主要是台灣或新加坡），一般表示學生的預期不高，多半視漢字為畏途，祇要能學一些基本會話就滿足了。至於學生方面，來自新移民和土生華人的家庭背景的小孩都有，更多的情況是家長不會華語，反而熱心讓子女學習華語文。也有一部分原住民學生學習華語，家長多半是財團以及有軍方背景者。

本人訪問過十幾位家長，甚至有將子女送到新加坡的家長，一般而言，這一代的年輕父母已經都以印度尼西亞語和子女溝通，許多年輕父母其實連基本的華語會話能力都沒有，反而有些家長因此有更強的動機。就動機而言，許多家長都提到對華語文的前景可期，顯示年輕家長對此有認識。他們也提到年輕一代已經習慣改以印度尼西亞語溝通，如果在印度尼西亞居住則華語對他們並不重要，如果想在商業發展英語反而更重要，這顯示學習華語文是商業利益的考量為多，族裔認同的因素也有，但在年輕的一代中已經不具有重要性。根據本人的觀察，對於子女在華語文教育上的投資，子女的祖父母的態度似乎更為重要，年輕的父母多忙於事業，對子女的教育多遷就現實，反而是祖父母一代更為關心，幾位將子女送到新加坡求學的家長，多是應祖父母一代的要求。

然而就正規的大學教育而言，首都有三間大學的文學院有開設漢語相關學系，即國立的印度尼西亞大學（Universitas Indonesia, UI），達爾瑪·佩薩達私立大學（Universitas Darma Persada），印尼埃薩·翁古爾私立大學（Universitas Indonesia Esa Unggul），各大學學習華文的學生，大部分是原住居民的子弟，使用教材由北京供給，學制分三年及四年制。其中以國立大學

⁶ 曉彤 (1995) 「印華文學的滄桑」(手稿)。

最為正規，目前印度尼西亞原住民中能以中文從事研究工作者，不超過十人，幾乎都是由印度尼西亞大學培養出來。本人訪問過上述大學的學系，多位老師表示，目前華語教學的師資奇缺無比，他們都有許多在外兼課的機會。筆者也訪問了幾位正在國立大學就讀中文的原住民學生，顯然地他們多能夠感受到華語在印度尼西亞的前景，尤其是在經濟領域方面，準備畢業後在商場上努力。

整體來說，目前華語文的前景在印度尼西亞是可以期待的，原因是由於三十多年的華文禁令使得年輕一代華語文整體的水準太低，可以有相當大進步的空間，即令印度尼西亞完全沒有華裔的問題，一個兩億人口的大國，僅有一個國立大學有漢語課程，華語文人才的確是不足夠，而目前湧入印度尼西亞投資的外商中，來自台灣、香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資金分別占了前幾名，預料未來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商業往來也會增加，所需的華語人才不足是顯而易見的。

未來政策雖然不明朗，但是政策的考量重點已經從過去對於共產主義的恐懼轉移，雖然一直到去年為止政府對待反對派仍以共產主義為罪名的控訴，但是以目前印度尼西亞資訊開放的程度，這一因素不會再扮演同樣的角色，同時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以後，各方面的交流都在增加，到目前為止並沒有負面的評價出現，加上馬來西亞一馬當先，積極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經貿關係，情況已經和過去大不相同，預料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尼西亞的各種經貿文化的交往會再增加。目前對華語文政策的考慮，主要在內政方面，即族裔關係的考慮。

一位負責族群整合事務的政府高級官員，**Bakom-PKB**的主席**Juwono Sudarsono**在1997年6月回答記者問題時表示，禁止華文出版品的禁令目前不會也不應該被取消，祇要經濟上的不平衡依然顯著，會造成民眾誤解而引起族群緊張關係的舉措應該避免。他明白指出族群關係仍然是主要的考慮因素⁷。他表示，「SARA問題仍然是十分敏感的。」SARA是指族裔、宗教、種族和集團之間的問題。然而即使華文禁令已有放鬆的跡象，雅加達和北京方面關係已經

⁷ 見Jakarta Post，1997年6月27日，Bakom-PKB是政府支持的機構，其宗旨為促進各族群間的整合，主要是處理華裔族群和原住民之間的問題。

越來越緊密，Juwono仍然認為華文禁令仍有必要。他說，「國內的政治穩定始終是最重要的。」當他被問到華文禁令是否和共產黨的威脅互相聯繫，他很快回答說，「這不是共產黨的議題，而是SARA的議題，許多原住民可能會十分擔憂中華文化的影響可能會隨之變強。」他甚至明白表示，「我們應該逐步改進，如果稍後在經濟上，富者與窮者關係改善，華文禁令才可以考慮放鬆。」

這種說法顯示就華裔和原住民的族群關係的性質而言已經和過去有所改變，從過去的國家民族主義問題轉而為貧富懸殊的社會問題，在印度尼西亞社會中一直存在反財團的情緒，有時會轉為反華裔的情緒⁸，以九十年代印度尼西亞社會所發生的衝突及暴動為例，許多情況下，華人產業仍然是暴動中易受攻擊的目標，惟性質和過去針對華人的暴動不盡相同，例如1994年的棉蘭(Medan)暴動，起因是由於工潮所引起，衝突是工人代表和蘇北省政府之間的矛盾所引起的。1996年發生多起暴動，引發衝突的議題亦多不相同，有政治上因反對黨的內鬥所引起的，宗教上有因為伊斯蘭和基督教的衝突，族群上有馬都拉人和達雅人的衝突⁹，由於華人產業目標明顯，常常成為參加暴動的民眾臨時起意的目標，一般印度尼西亞的輿論多以為是貧富懸殊所造成的不平衡心裡所致。

就九十年代華裔族群的情況來看，我們同時得到兩個不同方向的發展趨勢，一方面族群的關係不再似過去國家民族主義高漲時代緊張而且僵化，由於經濟發展的需要，大量華商台商資金湧入，華人以及中華文化不再被視為威脅，另一方面華人問題卻顯得更加顯著，華人企業家的資產卻引起了報刊高度關注¹⁰，96年到97年期間多起暴動中華人的產業遭到掠劫，族群問題可說是敏感依舊，仍是難解的問題。這種情況下使得華語文問題更形複雜，以目前的局面來看，對華語文進一步的開放政策是可能的，因為目前國際局勢的變化讓華語文禁令變得不合時宜，而且在執行上也有很大的困難，然而恢復舊觀也不可能，就政

⁸ 這方面的討論很多，可參考 A. Margana ed.(1994) Buku Putih TEMPO: Pembredelan Itu. Jakarta: Tempo. Adam Schwarz (1994) A Nation in Waiting: Indonesia in the 1990s.

⁹ Markus Rani, Anthon P Sinaga, Ronald Ngantung (1997) Rekaman Peristiwa 1996. Jakarta: PT Media Interaksi Utama dan PT Pustaka Sinar Harapan.這本1996年的大事記中，幾場暴動構成了1996年最重要的事件，可說是多事之秋，但似乎引發的理由都不盡相同。

¹⁰ Tan, Mely G.(1995) "The Ethnic Chinese in Indonesia: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In Leo Surdadinata ed.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The Socio-Cultural Dimension.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策而言，由於新秩序的政治結構沒有改變，沒有任何要大幅調整的需求，同時華裔問題對執政當局而言仍是戒慎恐懼，因此華語文禁令可能不會一下子完全放寬，即使放寬也不會祇讓華人來主導相關活動或機構的發展。

三. 華語文教育在東南亞國家的性質與展望

這個部分將提供一個分析架構來理解印度尼西亞在華語文問題的新發展，架構立基於從教育社會學或語言社會學的角度討論華語文教育在東南亞與各東南亞現代國家的關係，因此也希望這個架構能提供對整個東南亞國家華語文教育做進一步思考。東南亞國家誠然各國有各國不同的情況，但是仍然有某種程度的模式或者共同趨勢可尋，比較東南亞以外的地區，更可以比較出不同的特性。就華語文教育的性質來看，東南亞是華裔移民海外人口最多的地區，但是華語並沒有在任何一个東南亞國家取得優勢或相應的地位，即使在華人比例最多的新加坡，為考慮團結不同族裔背景的公民，英語順理成章成為教育的第一語言，因此華語文教育必須在現代國家中以次要的語言教育來考慮生存之道。就國家的性質而言，多數東南亞國家並不以多元文化主義做為國家構成的原則，相反的，由於東南亞國家多有一段殖民地爭取獨立的歷史發展過程，國家民族主義以及民族國家模式都是主要的追求目標，這些條件構成了華語文教育和其他地區不同的基本性質。

就華語文教學在非華語區國家大體區分有兩種不同的問題導向，一種是在八十年代以後華人主要移民國家，尤其是在華人移民較多的英語系國家，例如美加紐澳等國，華語文教學並不構成當地嚴重的社會或政治問題，即使引起某種程度的議論，問題的性質也不是在於華語文教學應否存在，而是在華人移民適應當地的問題，這些國家近年來採行多元文化政策，對於各族裔本身的文化傳統的保存，採取比較積極正面的態度，因此華語文教學的空間很大，主要關心的問題就在於師資、教材、教學法等等提高華語文教學品質方面。

另一種主要是在華裔人口眾多的東南亞國家，由於華裔移民歷史淵遠流長，早在這些新興國家獨立或改行現代體制之前，華裔已經成為當地社群，華語文教育系統早已經存在當地，在新國家建立以後，如何整合國內存在的不同集團都是政治上考慮的主要問題，華語文問題則是其中重要的一環，因此華語文教育

的性質主要在於華語文的地位與當地的政治社會互動關係，五十、六十年代國家民族主義高漲，站在國家整合的立場，對華語文教學並不歡迎，有些國家尚可容忍到一定程度，如馬來西亞、泰國等，然而也有些國家採取比較嚴格的政策，如印度尼西亞。

如果就教育社會學或語言社會學的角度而言，一種非優勢地位的語言教育要在現代國家中存在，可能有兩種主要的性質，一是做為一種少數族群的文化特質，即將少數族群語言，做為一種文化認同的對象，另一種是做為一種在區域內重要的外語，例如中東地區及伊斯蘭世界的阿拉伯語，或是東歐的俄語。就前者而言，少數族群維持本族裔語言，文化認同是最主要的因素，語言教育不僅祇是涉及語言教育本身，還包含了語言所能提供的文化遺產，就後者而言，一種特定語言被認為是一種區域內重要的外語，所涉及的是語言在政經社會中的角色地位，最主要的因素是將語言視為一種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而讓不同族裔背景的人可以珍視此一語言的價值。

就文化認同而言，少數移民族裔在感受到自身和主流社會的差別，通常會特別揀選某些文化特質做為族群認同的象徵，語言是個比較明顯的可以用來區別的文化特質，把語言視為文化認同的一個重要的因素，歷史上不乏其例。但是不同族裔仍有相當大的差別，如法裔以及阿拉伯裔移民是相當強調語言的重要，而印度裔、愛爾蘭裔和猶太裔移民則並不認為語言是重要的認同象徵，就華裔移民而言，由於認為文化傳承須依靠語言，一般情況下應是比較重視語言傳承的，但是經過不同世代和當地社會的發展，各地區的華裔移民態度上差別很大。

文化資本原是用來描述社會的優勢階層，透過教育再生產主流文化，使得其文化特質具有象徵性的權力¹¹，然而後來文化資本這一概念成為教育社會學的重要課題，應用的範圍越來越廣，不再限於是主流文化的再生產，也不限於階級的討論，不乏有將移民或少數族群的文化特質視為一種文化資本來討論的例

¹¹ Bourdieu, Pierre 1990(1977)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子，而視第二語言教育為文化資本的累積¹²。在本文的討論中，僅僅視語言為一種溝通工具，個人具備不同的語言能力，可以和不同語族人士溝通，自然構成個人的文化資本。把語言視為文化資本，和把語言視為文化認同，這兩個架構的關係不一定是互相排斥，有時是相輔相成，例如美國加州的西班牙語，開始祇是從拉丁美洲來的移民的語言，但是後被認知成為當地一個重要的語言資產，現在非西班牙語裔也樂於多少學一些西班牙文。但是有時太過強調語言與認同關係時，反而阻卻了其他族裔去接觸或瞭解，例如歷史上希伯來語。我們應該放在具體的時空背景來討論。

首先就將華語教育視為少數族群語言來分析。過去華人在非華語國家或地區爭取華語文教育，主要是以這個架構為立場，即視華語教育為維繫少數族群認同的方式，是以少數族群應有保存族裔傳統權利來立論，爭取在國家的教育系統之內或之外，維持少數族群語言教育。這種需求是具有相當的普遍性，許多由移民構成的少數族群都有同樣的做法，然而由於移民也有要進入社會主流的壓力和需求，如果要能達成維持族群語言教育目標，通常多元文化主義教育或是至少雙語教育是被認為是可以協調各方立場的較佳方式，如果有幾個不同的少數族群都有同樣的立場，多元文化主義的架構比較容易成形。

就東南亞國家而言，這種預期有困難。東南亞國家多半是戰後才爭取獨立的新興國家，國家民族主義的情緒至今仍然強烈，國家整合一直被視為主要目標，而人數眾多的華裔移民，則經常被視為妨礙國家整合的主要對象，同時在東南亞國家追求獨立之際，國家民族主義主要是以民族國家模式為對象，希望成為單一民族語言的民族國家。以印度尼西亞來說，”Nasional Intergasi”(國家整合)經常是報刊上討論的主題，由於在爭取獨立的革命時期打江山的一代人還在掌權，國家整合視為最高價值是天經地義的事，而華人在印度尼西亞，不論一部分人如何融入當地社會，華人集團經常被視為不整合的一群。如果寄望國家成為多元文化主義的國家，目前沒有這樣的發展趨勢，很難如此期待，就國家民族主義的長期發展來看，以印度尼西亞領土分散族群眾多，國家整合未來應該還是政治主樞之一。

¹² 把第二語言教育當成「文化資本」來討論，例如 Ben-Rafael, Eliezer and Hezi Brosh (1991)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Diffusion: The Obstacles to Arabic Teaching in the Israeli School.” *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 15 (1):1-24. 以「文化資本」來討論少數族

就人口結構而言，華人及華裔在東南亞國家也有不利之處，前述移民爭取少數族群教育權利的現象是有普遍性，然而華裔人口在東南亞各國幾乎都是最顯著的由外來移民構成的少數族群，不像在美國有西班牙語族裔或是加拿大有法語族裔等其他族裔共同爭取權益，因此單單由華裔族群爭取少數族群權益幾乎是很難得到當地其他居民的共鳴。其中華裔在當地的人口比例和政治社會地位尤其是重要的決定因素，就印度尼西亞而言，雖然華裔人數眾多，但人口比例僅約3%，既沒有多到有談判的力量，也沒有少到不引起特別注意的地步，而缺乏其他族裔處於同一立場，成為尷尬的少數族群。

尤其是過去在冷戰時期，東南亞各國以亞細安(東盟，東協)為中心，甚至將華裔問題當成是區域內共同的問題，都曾經把華語文和其國內華裔移民的政治認同以及共產主義在區域內的傳播聯繫在一起，構成很大的問題，後來隨著冷戰秩序的結束，情況才慢慢轉變。由於華語文問題經常和華裔族群認同問題掛鉤，於是形成相當敏感的問題，除了印度尼西亞以外，在越南、柬埔寨、緬甸等國都曾經禁止華文教育，菲律賓、泰國雖然不完全禁絕，但是也採行同化政策，希望將華語文教育控制在一定的範圍內，在東南亞各國之中，祇有星馬地區有國家教育體系內有華語文教育的存在。菲律賓和泰國仍有華文學校存在，但屬於私立學校的體系，由於對華裔採取鼓勵式的同化政策，新一代的思想是當地認同為主流，華語文日漸式微。而越南、寮國(或稱老撾)、柬埔寨、緬甸(或稱緬瑪)都曾有禁絕華語文教學的記錄，唯當時各國都是處於政治動蕩不安狀態，不能視為平常時期的決策。但是這些衝突的背後，都是在於少數群族的需求，被視為和國家的目標有所抵觸所致。

另一個思考方式是，把華語文視為區域內重要的外語，而將華語能力視為文化資本，而不要求僅僅將語言教育和少數族群問題掛鉤。就語言的歷史發展而言，能夠成為區域性的重要外語，常常不是主觀意志可以達成，必須要歷史條件的配合。從九十年代的發展來看，似乎具備了初步的條件，時機可能尚未成熟，但是做為概念的提出，應該已經可以看出這一趨勢。華語做為區域內的文化資本，這種架構是由印度尼西亞華語文發展的狀況推衍而來，但是也需要看

群或移民的文化背景，例如 Persson, Gunnar (1978) School Achievement of Immigrant Children: The Impact of Social Class and Nationalit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16(1):23-28.

其他國家未來的發展，是否未來也可以用來觀察其他東南亞國家則有待未來的發展。

一種語言是否能被認知為文化資本，要看其他族裔對此一語言的態度，日前在東南亞地區，已經出現了非華裔有意識地學習華語的現象，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都有這種現象出現，人數多少是一回事，至少就現象的出現標誌了新的發展方向。就印度尼西亞的情況而言，華裔族群的年輕一代經過了三十年的華語禁令，過去所區分的土生華人(peranakan)和新客華人(totok)已經不再重要，而都採用印度尼西亞語溝通，因此華語禁令即使開放，華語也不可能成為華裔族群認同的象徵，而華裔子弟在印度尼西亞所受的教育和原住民(pribumi)並無二致，以致於當華語禁令開始放鬆之際，華裔與原住民幾乎可以在同樣的起跑點上，而目前在大學裡學習的原住民學生以及前述少數原住民學習華文，現在雖然人數很少，也表示了這種語言突破族裔界限的可能性。

而一個語言是否能被認知為一種文化資本，也視這種語言是否在某一領域內被視為重要的工具，例如宗教方面伊斯蘭世界的阿拉伯語。就華語在東南亞的情況而言，當今的條件使華語成為印度尼西亞年輕一代的文化資本之一是十分明顯，主要也是在於過去的歷史發展使得華語人才在印度尼西亞嚴重不足，而經濟的發展又使得華語成為重要的經濟語言。目前印度尼西亞境內及境外最重要的商業夥伴，華語都是相當重要，來自台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的華商是印度尼西亞外來投資的前幾名，同時透過在東南亞各地的可以講華語的多語人才，可以很深入地觸及各地的據點。這個局面是很明顯，印度尼西亞官方也明白這一點，幾年前調整了華語文在旅遊業的應用即可視為此一架構的一環。

把華語視為文化資本，同時鼓勵華裔與原住民一同來學習華語，對於減輕華裔族群面對同化政策的壓力以及解決印度尼西亞華語禁令，都是比較合宜的架構。就印度尼西亞對華裔的同化政策而言，這是個包含許多歷史情結的政策，即使華裔族群中也有正反對立不同的意見，短期之內看不到調整的可能性，即使調整也不可能參照多元文化主義的模式，因為國家的人口結構不具備這種可能性，即使是對華語文的禁令完全開放，華語在印度尼西亞華裔之間也不可能恢復舊觀，更何況目前在族群衝突不斷的時刻下，貧富懸殊又不是很容易克服的情況下，不能寄望對華裔的政策有突破性的調整。如果族裔關係短期內不好解決，不如改絃更張，把華語定位為區域內的重要外語，讓印度尼西亞當局不

必把華語禁令和族裔問題混在一起談，未來如果增加原住民學習華語，對於增進族群間的瞭解，都有莫大幫助。

此一架構似乎已見端倪，觀察九〇年代的東南亞華語文的發展，像是熬過了漫長寒冬，開始重新長出新綠。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出現許多非華裔居民學習華語，馬來西亞據估計約有五萬名馬來裔及印度裔子女上華文小學。泰國和菲律賓都傳出「華語熱」的議題。而越南、柬埔寨和緬甸等，雖然過去或內戰或封閉，華語教育停止了一段時期，現在卻在急速地恢復中，甚至有超過以往的規模，由於台商以及其他各地華商在這些地方活躍，華語都成為熱門外語。因此華語成為在東南亞跨越國界的語言，為了做生意而學遍東南亞語言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華語卻在東南亞各國都有本地人口，華語在工商界的地位是顯而易見的。回溯華人移民東南亞以及華語教育的歷史，可以說是一個歷史偶然的結果，早年在各地為華語教育犧牲奉獻的前輩當初可能完全沒有想到歷史的峰迴路轉，現在東南亞各國經濟掛帥的時代，華語教育的果實卻讓下一代收成。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掌握住時代變遷的方向及可以發展的空間。

結論

本文就印度尼西亞的華語文問題做探討，先由歷史回顧，討論在印度尼西亞這塊領土上曾經有的燦爛與沈寂，然後分析印度尼西亞對華語文禁令的歷史成因，再就九〇年代的新發展做評估，然後從東南亞國家的大氣候來探討，以對問題有不同層面的瞭解。在從印度尼西亞現代國家歷史的分析來看，華文禁令因涉及九三〇事件後新秩序的建立，加上長印度尼西亞國家民族主義的思想傳統，成因複雜，不易調整。然而在九〇年代卻有新的進展，局部開放了華語的使用，使得華語的學習開始復甦，惟考慮現階華裔族群與原住民的族群關係，卻仍舊敏感。

就東南亞華語教育分別提供分析歷史以及新發展的架構，並以此分析印度尼西亞華語文問題的過去及現在，並認為應以不同的觀點來看待新發展，視華語文為文化資本，可能比較適合華語文現階段在東南亞的發展，由於亞洲經濟的勃發，有了新的契機，華語成為跨國企業活動的重要語言，由於區域經濟的發展，東亞和東南亞的來往互動很頻繁，貿易商經常在各東南亞國家進出，在跨

國企業工作的人都隨時有可能調到另一個國家工作，由於東南亞各地都有華語人口，隨著華裔商人在區域內的成長，華語在工商業的實用性增加也可預見。

即令如此，華語文教育必須在現代東南亞國家的架構下運作的情況仍然要清楚考慮，華語文問題至今仍然難以認為是完全解凍，各國仍小心翼翼，即使是在星馬地區也仍是敏感問題，不時仍然會造成問題，直到最近，在新加坡提倡華語的反對黨人士會被指為「華族沙文主義」；在馬來西亞，華教人士可能被剝奪民權，甚至被逮捕拘禁。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利用這個契機，確保已有的成果，在東南亞現代國家的條件下，必須仔細分析華語文在各國發展的歷史成因，以及對各國做為新興現代國家的基本情勢以及思惟方式的做出分析，才不致於失之過於樂觀或是一廂情願，考慮族裔關係和國家整合方面，華語文在某些國家仍是敏感的問題，這些國家都有強烈的文化國家民族主義，我們不可能期望這些國家，會邁向多元文化主義國家的發展道路，會開放到對華語文教育完全不干涉的地步，那麼如何發展符合各國國情的方案，能夠讓當地國政府與民眾接受或理解，發展出適合各國情況的架構，就成為值得再思考深究的課題。

參考文獻：

小沈(1996)「破天荒的第一次！首期華文教師進修班圓滿成功」．『印尼與東協』第57期(1996年7月)

陳國華(1992)先驅者的腳印----海外華人教育三百年。Canada: Royal Kingsway Inc.

Badan Koordinasi Masalah Cina-Bakin (1979) Pedoman Penyelesaian Masalah Cina di Indonesia. Jakarta: Badan Koordinasi Masalah Cina.

Ben-Rafael, Eliezer and Hezi Brosh (1991)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Diffusion: The Obstacles to Arabic Teaching in the Israeli School." *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 15 (1):1-24.

Bourdieu, Pierre 1990(1977)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RM. H. Subanindyo Hadiluwih (1994) *Studi Tentang Masalah Tionghoa di Indonesia*. Medan: Dhian Doddy Press.

Kwee Tek Hoay ed. Lea E. Williams (1969)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Movement in Indonesia*. Cornell.

H. Junus Jahja (1991) Nonpri di Mata Pribumi. Jakarta: Yayasan Tunas Bangsa.

Nio Joe Lan, (1940) Riwayat 40 Taon dari Tiong Hua Hwe Koan Bataria, 1900-1939.

Persson, Gunnar (1978) School Achievement of Immigrant Children: The Impact of Social Class and Nationalit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16(1):23-28.

Markus Rani, Anthon P Sinaga, Ronald Ngantung (1997) Rekaman Peristiwa 1996. Jakarta: PT Media Interaksi Utama dan PT Pustaka Sinar Harapan.

Leo Surdadinata ed.(1995)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The Socio-Cultural Dimension.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Williams, Michael (1991) China and Indonesia Make Up: Reflections on a Troubled Relationship. In The Role of the Indonesian Chinese in Shaping Modern Indonesian Life.

附錄：印度尼西亞華語文問題大事記

印度尼西亞華語文問題大事記	
1945年	8月17日印度尼西亞宣布獨立
1949年	印度尼西亞共和政府正式接掌政權
1952年	頒布「外僑學校監督條例」，管制外僑學校教學內容。
1957年	禁止印度尼西亞籍華人在華語文學校就學
1958年	右派華文學校被封閉
1959年	軍政當局徵用華文學校校舍，使華校停課
1965年	930事件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政變失敗
1966年	所有華文學校被接管
1969年	開辦民族特種學校，每週可有兩節華文課
1974年	查封所有民族特種學校，由地方當局接管
1978年	全面禁止華文書到進口
1990年	印度尼西亞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邦交
1990年	國民福利基金會(促進華文組織)成立
1994年	棉蘭(Medan)工潮引發暴動
1994年	8月 局部放寬華文禁令
1996年	6月15日 半官方「華文教師進修班」舉辦